



传记丛书

吴相湘 著

宋教仁传

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宋教仁传

吴相湘 著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教仁传/吴相湘著. —北京: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
2009.12

ISBN 978-7-5000-8252-1

I. 宋… II. 吴… III. 宋教仁(1882~1913)—传记
IV. 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5896 号

策 划 人:郭银星

责任编辑:郭银星

封面设计:巴蜀阳光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:100037 电话:010-88390093

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作

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14.75 字数:195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00-8252-1

定价:3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这一册宋教仁先生（1882～1913）的传记，原题作“宋教仁与中国革命”。为使读者对于宋先生在国史上的地位可以一目了然，又曾采用“宋教仁：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”一书名。事实上，宋先生确是为中华民国宪政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。

这一传记的出版，正值举世研究和阅读中国现代政治与人物之兴趣最强烈的时候，当可适应多数人士的需要。但如果被认为是趋时应景之作，则相湘实不敢承；因为相湘怀抱为宋先生撰写传记的心愿已有 30 余年。

回忆童年就读湖南私立楚怡小学，在其实行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的环境中，开始对历史课程产生较多兴趣。课余又尝至同学蔡端生、黄一寰两兄家，瞻仰开国元勋蔡（锷）、黄（兴）遗像遗物；端生兄且扬言长大后必为其父撰一大传。高山仰止及私心羡慕之余，亦窃有意为建国伟人撰一传记。先严汉声府君（讳其林，1878～1937）因训示：我常德郡宋教仁先生之丰功伟绩亦与黄、蔡齐名；并为言与宋公交往以及同旅日本时之若干照片。

自相湘肄业北庠，学习兴趣倾向近代史；复因日人萱野长知

致冯自由先生书函（对于黄、宋等革命史实不宜忽略，见冯著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）之启示，乃更加速搜求资料以冀宋先生传记得早完成。

不幸，对日抗战发生，长沙大火，常德会战，两大城市均成灰烬，先严数十年之藏书及手写日记（其中多有可与宋先生《我之历史》相证补）与相湘自北平携归之多种史料，均未能幸免于难。痛心之余，又见报载宋先生遗属寡媳一人在桃源转徙流离孤苦伶仃之讯（宋之独子歿于抗战前），更伤英雄无嗣之凄凉。“从头做起”，搜集资料以为宋先生撰传之心念转而弥坚。

自抗战胜利，相湘在北平、上海、苏州、南京等地重作搜求，幸又获得宋先生关系史料若干种，1949年春挟以渡海来台，喘息稍定，即往各图书馆继续查寻。1958年秋，台湾大学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合作研究中国近代史，相湘之《宋教仁先生传记》被列为其中专题研究之一。旋且得“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”同意阅读其党史史料库之资料。经过两年的工作——其中并曾有往美国、日本各大图书馆访寻史料之机会，这一宋先生的传记，遂在历经大劫之后终底于成。对于协助完成这一工作的学校和机关（如上述）实在非常感谢。

全稿完成以后未克即时印行，只将其中一极小部分《袁世凯谋取临时大总统经过》，发表于《中国现代史丛刊》第一册，竟很快引起海内外学人的注意，日本《东洋学报》（第四十四卷第四号，1962年3月，东京刊行）且摘要予以介绍，颇多推誉。

本书内容综合叙述与分析解释并重，对若干重要史实均力求提供新记录与新解释。例如引起“二次革命”之宋先生死因，即与过去诸著述完全不同而自信确能得其真相。至于当时环境背景与同时人之言行尤尽可能多予触及与描述，以助读者了解全盘政

治动态。又为使文省事增及考订异同，全书附注详明，其分量几可与正文相等。希望读者注意。

撰写这一自序将毕，虽有稍稍了却 30 余年心愿的轻松之感，然而偶一自念才能学识之短缺，实在未能将这一为民主宪法而牺牲的“勇者画像”神采描绘于万一，又不胜惶愧之至。惟有诚恳地希望读者们的教正。

1964 年 5 月 24 日

《宋教仁传》是吴相湘先生有关中华民国史研究的第一本著作，初版于1964年。

宋教仁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，又是民初国民党的创始人，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本书以详实的史料，对宋教仁的历史活动做了充分的考察，澄清了以往的误传和错误，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结论，可以说是海内外有关宋教仁研究的奠基之作。他的某些判断与结论（诸如北京兵变的内情），已经为后来的史料所验证，这也证实了他观察的细密和运用史料的能力。所以本书出版后，一直广受好评，至今仍然是研究宋教仁与民国史的必读书。

目 录

自 序

第一章	求学时代之环境与背景	(1)
一	经世致用学风之复兴	(2)
二	讲求时务注意新学	(3)
三	湖南自立自保之主张	(5)
四	湖南留日学生刊行《游学译编》	(7)
五	民族主义之教育与湖南自治论	(10)
六	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革命风潮	(13)
七	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举义之失败	(16)
第二章	日本六年	(23)
一	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与《醒狮》	(24)
二	中国革命同盟会之成立	(27)
三	革命建设基础在高深学养	(31)
四	游说马侠与间岛问题	(35)
五	同盟会之悲欢离合	(40)
第三章	对内政外交的主张	(52)

一	对外关系之认识	(53)
二	建设真正民权之立宪政治	(57)
三	遵奉民生主义 推行社会政策	(60)
第四章	大革命爆发前后	(74)
一	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	(75)
二	长江上下游的奔走联络	(80)
三	临时政府之组织	(85)
四	袁世凯阴谋与宋之对策	(91)
第五章	政党政治之尝试	(120)
一	同盟会之团结与改造	(122)
二	不恋权位 只重政见	(130)
第六章	为民主宪法牺牲	(151)
一	国民党之组织	(154)
二	孙黄北游之前后	(159)
三	国会议员选举与大政见	(166)
四	盖棺论不定	(174)
引用史源及重要参考资料		(211)
一	宋氏本人著述	(211)
二	同时人著述	(212)
三	手写本及档案	(226)

第一章 求学时代之环境与背景

宋教仁，中国现代史上一伟人也，其人之重要性，不仅由于彼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之主要组成分子、中国同盟会之发起人；更由于彼能以实际之行动，力求促进中国政党政治之正轨，虽所志未遂，遽以身殉；然其主张，迄今固仍为中国人奋力追求之目标，国父孙逸仙先生尝谓：“宋氏乃为中国宪法而牺牲之第一人”^[1]，诚为符合历史之论。

宋氏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。湖南民性自古坚忍剽悍，操之过激，铤而走险，语云：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”盖其明证。降及近代，曾国藩即利用此特性创立湘军，以一省系天下之安危，转移举国之风气，其事固有足多者。桃源则与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同为中国人所熟知，山明水秀，溪回曲折，优美之自然环境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之宋氏，自不能无其影响。虽然宋氏尝有言曰：“吾则沅湘间产也，地近江浦，犹念曾国藩、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，而能摧陷大敌，人奉为宗。其是非亡足论，观其识度，无忝于英雄，其民又乐为之致死，岂其风烈遂繁于今？！”^[2]是湖南强悍之民风与曾国藩辈倡导之经世致用之学术环境，对于

宋氏思想与事业之感召，显然更甚于前者。

一 经世致用学风之复兴

经世致用之学原为中国文化之正宗，孔子曰：“士，任重而道远。”固慨乎其言矣。北宋范仲淹秀才先忧后乐之呼吁，益振醒知识分子之责任感与自尊心。同时司马光纂辑《资治通鉴》复为经世致用学者订一重要典范。不幸南宋以降，士大夫痛国家之多难，慷慨激昂，转多虚矫之论。历经辽金元三朝，中国知识分子遂遭遇空前之迫害；明初复创八股制艺以束缚读书人之思想，又用廷杖诏狱以凌磨士大夫之尊严；致使当时士人惟有逃避现实。逮朱明覆亡，顾亭林诸氏奔走呼号，力倡“行己有耻，博学于文”，痛言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始为经世致用之学开启一新途径。

然时值满清入主中原，固绝不愿见此种学风之滋长，且为巩固其统治权，更复变本加厉，以摧残之、压迫之，文字狱之繁兴，博学鸿儒科之创立，四库全书馆之设置，交相为用，务使士大夫无法冲破种种罗网，如不入我彀中，即自屏于政治之外。雍正乾隆时，达官自刻奏议，往往得罪，记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韪，于是文人著书立说，多不涉当世之务，繁琐考证之风特盛，固士气消沉已极之明证。逮嘉庆朝，仁宗天资长厚，略变两朝箝制之意，历二十余年之久，后生新进，顾忌渐忘，稍稍有所撰述，虽未必即时刊行，然能动撰述之兴，即其生机已露也。至道光初叶，则时事之接触，切身之患，不得不言者有盐务、河工、漕运三大端，议论蜂起，贺长龄、魏源竟汇而刻之，命名《皇朝经世文编》，于道光六年（1826）行世^[3]。未几，海警渐动，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，疆臣又为之倡导，道光二十四年

(1844) 魏源纂辑之《海国图志》梓行,是为中国近代士人综合中外资料所为知己知彼之第一部著作。而其先一年,何绍基、张穆创建顾亭林祠于北京广宁门内之慈仁寺,岁举祀事。有谓此为“中国近百年世运之关键者”^[4]。以今论之,要非过甚其词。

盖学风士习从此丕变,士大夫一反前此空疏逃禅之积弊,而秉持亭林之诏示,振经世之绝学,身体力行,见诸行事,曾国藩则其代表焉。观乎曾氏服官京师,尝读书于顾氏祠侧,对于亭林极尽向往之诚,创立湘军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号召,用儒生为统将,募农夫充行伍,士人匹夫均因此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壮志,湖南全省之义声震天下,遂使举国之人咸知引国事为己任,民权之得伸,自此始也^[5];而其传刻王船山遗书,民族大义因之流播益广,有谓曾氏言行即为辛亥革命肇端者^[6]。宜乎宋氏誉之英雄,今人谓近百年世运之关键有在也。

宋氏出生于1882年,其时曾国藩已早歿,自不能望见丰采,然流风余韵固犹盛传于洞庭衡岳间,且湘军仍肩天下之重任,旌旗声威正远及天山南北,所谓“无湘不成军”,尤为三湘人士常引以自豪者。宋氏自幼即喜闻当时事,尤喜谈兵,尝嬉戏簿诸邻儿名氏,呼集山阿,树巾为旗帜,自登磐石上指挥部勒之^[7],是环境影响使之然也。

虽然世变日亟,国难益殷,对于宋氏之新刺激亦更加甚焉。

二 讲求时务注意新学

1894年夏,中日战争发生,湖南巡抚吴大澂亟募勇成军,请缨赴前敌,三湘人士踊跃应征,盖仍湘军经世救国之余烈,足以鼓舞群伦也。不幸时移势易,黄海一战,中国既告失利,制海权遂入日人掌握,步卒无所用其技。翌年春,和议将成,时适会试

之年，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，深痛城下之盟，吁请迁都再战，湖南广东举人同日先后上书陈词，各省闻风响应，士气为之伸张。康有为、梁启超复致书上海汪穰卿，促其鼓动新任湖南学政江标在湘厉行新学，使其于按试时，非曾考经古者，不补弟子员，不取优等；而于经古一场，专取新学，其题目皆按时事：以此为重心，则禄利之路，三年内，湖南可以丕变矣；盖梁启超以为十八省中，湖南人气最可用，惟其守旧之坚，亦过他省，若能幡然变之，则天下立变矣^[8]。

以今按之，梁启超之主张，江标实完全付诸行事，既于校经书院内设立舆地、算学、方言学会，刊布《湘学新报》，1897年冬复梓行《沅湘通艺录》八卷，以示风会之所趋。今试举其书内容如：“问近日俄兵入朝鲜，幽国王，杀大臣，重改国政，中日两国有何损益？”“欧洲诸国不许俄国出黑海论”“英人有公（自由）保（保守）二党，中国将来是否有此气象说？”“拟自造各种机器遏洋货利权议”“有铁路始可广言开垦说”“魏氏海国图志近日应改应增条例”“说西南洋之华民”“学新法须有次第不可太骤说”。固均梁氏所主张“皆按时事为重心”者。而其作者如唐才常、毕永年、杨毓麟、邹代藩、谭延闿、胡元倓等^[9]，此后均为中国现代史上之重要分子，是此一新教育计划影响之巨大可知矣。

方江标之督学湖南也，1896年6月，梁启超、汪穰卿同创《时务报》（The Chinese Progress）出版于上海，译述东西各国重要报刊，并著论剖析时事，指导国是；其后章炳麟、曾广铨亦参与笔政。以是一册风行，更见洛阳纸贵。湖南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与城南求忠两书院院长，公同商定，拨公款按月购置，并手谕生徒，细心阅读此一“目前不可不看之书”^[10]。1897年1月，王

先谦又具呈湖南巡抚陈宝箴及提学使江标，请即设立时务学堂。当经陈、江允准，积极筹备，同年夏布告：订期9月24日招考学生——陈氏示谕有云：“海疆互市，内地之讲求西学者，湘人士实导其先”，“今洞庭衡岳之间，蕴积日深，必有英奇魁杰，继轨前修，出而任匡救之重，以图报国家者！”“当此需材孔亟之际，诸生体验时事，必能相与奋发”；“中国自强之基，诸生自立之道，举莫先于此矣！”“须知此次迅获实效，力矫从前虚应故事积习，庶于大局有裨！”^[11]其寄望于斯举者如此，而特聘梁启超主讲席，尤足资号召。

三 湖南自立自保之主张

湖南时务学堂既开中国近代学校之嚆矢，梁启超辈之所讲授者尤启发湘人革命之思想。盖梁氏应聘赴湘之先曾在沪与康有为、汪穰卿等集议：金以中国各省，惟湖南地处腹里，士气振奋，苟及早修饬，或可自固；因商订进行之宗旨，在采激进法，以彻底改革，洞开民智，鼓吹种族革命为本位；故梁氏莅校后之讲授及批解学生札记，非徒心醉民权之论，抑且有种族之感，革命之言，未尝有讳也^[12]。

虽然此不过梁氏努力之一端耳，而其主要目标，固仍在促成湖南之自立自保，故莅湘伊始，湖湘人士谭嗣同、唐才常辈组织南学会时，梁氏即乐为之序，力言“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藪也，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。今诸君子既发大愿，先合南部诸省而讲之，庶几官与官接，官与士接，士与民接，省与省接，为中国热力之起点，而上下从兹其矩矱，学派从兹其沟通，而数千年之古国或尚可以自立于天地间也。”^[13]

其寄望于三湘人士者如此殷切，而德国进占胶州湾之消息远

播，列强瓜分中国之谣传益甚，时事更形紧急，梁氏因复专函陈宝箴，痛论湖南自立自保之重要性及其步骤：

今日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，而欲以变法之事望政府诸贤，南山可移，东海可涸，而法终不可得变……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，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。

所谓自立者，谓为他日穷无复之时计耳，岂曰为目前之言哉。而无事则整顿人才，兴起地利，其于地方之责亦固应尔，而终不必有自立之一日，此岂非如天之福乎。脱有不幸，使乘与播迁，而六飞有驻足之地；大统沦陷，而种类有倚恃之所，如是焉而已。

大局之患已如燎眉，不欲湖南之自保则已耳；苟其欲之，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，民智同时并启，人才同时并成，如万毫齐力，万马齐鸣，三年之内，议论悉变，庶几有济。^[14]

其时三湘绅民多已闻风兴起，浏阳算学馆、湖南龙南致用学会、郴州学会、法律学会、衡州任学会、常德明达学会先后成立，均以涤向来孤陋之习，储当时济变之才，本中国义理之学，参泰西富强之术为主旨！^[15]其中明达学会，距离宋氏乡里不过百里，风声所播，耳濡目染，对于宋氏思想之影响，应可想见。

不幸此一新情势，不过昙花一现，旋因朝局之反复（戊戌政变）而中断，谭嗣同且以身殉其“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，方有复兴之望”之主张。两年后，唐才常为继承死友遗志，推翻顽固守旧势力，倡组自立军，创自立新造之国，又不幸餉糈

缺乏功败垂成。然先烈之血，主义之花，前仆后继，屡败屡战，乃三湘人士之特性，湖南青年均因此一再之刺激，矢志与腐恶之势力奋斗到底^[16]；而清廷于八国联军之役以后，为掩饰失败，缓和民情，不得不下诏变法，以废科举、兴学堂、派游学为新政之起点，青年学子遂得优游新天地中，触目随遇，无非震撼，思想之束缚大告解放，终以形成国民革命之主流。

四 湖南留日学生刊行《游学译编》

选派青年，留学外洋，曾国藩既首倡其事，陈宝箴在湘推行新学亦注意及此，曾拟招考留学成本学生100人。寻以戊戌政变发生，致不果行。其后时务学堂助教学生及其他自留学生陆续东渡者约计60余人。而桃源、晃州、麻阳等地学生，且早于1898年9月到东京入大同学校，足见新政影响及于湖南边僻州县。逮1902年，湖南官绅始选派公费生东渡，并将留日自费生之贫苦者亦悉化为公费。已而湖北亦派西洋留学生30名，东洋留学生50人，其总数视1901年且逾四倍。于是湘鄂两省之官费学生，连镳并轡，称盛于一时，其中黄軫（兴）、杨守仁、杨度、胡元倓、陈润霖、陈天华、刘揆一等，尤著名者也^[17]。

黄軫（兴）、杨度既至东京，时与日本师友接触，问学研讨之余，深感救国之道，必先有理论，而后有事实，有学术而后有政治；尤须破除过去定于一尊之学风，始能尽除保守濡滞之积习；而介绍东西洋自由之学说，尤为开启新机运之前提，因相与集议于1902年10月创刊《游学译编》，其发刊主旨有云：

我中国者以东洋文明之固有，而得老大之名；以西
洋文明之将来，而得幼稚之名；乘此迎新送旧之时，而

善用其老大与幼稚，则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，夫岂难耶？同人之译是编也，将为扶持老大培植幼稚之助也。

居今日而言救国，其必一国之国民，人人自励，人人自竞，先使一身之学术，无一年无一月无一日无一时而不要其进步！^[18]

因之，是以博采书报择而译述介绍新知为原则，别其内容分为学术、教育、军事、实业、理财、内政、外交、历史、地理、时论、新闻、小说十二类，而其揭示白话小说，足以唤起国民之精神，更可注意。其言曰：

凡一国之语言文字，歧而为二者，其国家之教育，人民之进化，必不能普遍于全国上下，而学人以为经世著书之具，务求为高雅闳博之词，则文学反以阻国民之进步，故不独词章家之以雕琢为诗文，取悦一己而不求人知者之不足厕于一国之文学界也，即有心于当世者，亦以此计其功用之大小，而分其品次之高下焉。俄国学者特而斯特（Leo Nikolaevich Tolstoy）（今译“托尔斯泰”——编者注）之论艺术也，分广义与狭义，而小说与诗歌美术等，同在狭义之中；其总论曰：艺术者，使作者之感情传染于人之最捷之具也，作者之主题当如何，则必以直接或间接向于人类同腔的结合而求其好果。以为感情之用也，彼斯脱洛（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）之为世界大教育家也；以读路索之也米儿（J. J. Rousseau: Emile）（今译《爱弥尔》——编者注）小说